

一组文人行为的基因图

一个古老阶层的命运史

做派

肖鹏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做派

肖鹏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做派/肖鹏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1

ISBN 7-5039-2292-3

I. 做… II. 肖… III. 叙事散文—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1801 号

做 派

著 者 肖 鹏

责任编辑 蔡宛若

封面设计 [] 工作室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books.com

电子邮件 editor4@whysbooks.com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31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292-3/I·1048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如果不了解这些古老行为，你很可能读不懂文人。如果你读不懂文人，那你就根本弄不清楚这个古老的民族究竟是怎么回事。

——罗伯特·戈德尔



自序

冬天又来临了。我在寒风中舔了舔它的味道，仍然不是我记忆中的冬天，我认不出它是谁。

我孤独地站在海边等待着，像等待一个失约的朋友，背后是那个万商云集的繁华城市。这座城市到处都是鲜花和绿草，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少真正的寒冷。每年我们迎来的所谓冬天，大半是这类赝品。说是冬天，其实也就是北方的半幅深秋。

想起1997年冬天，高晓声在老朋友李士非的陪同下来深圳避寒，住在蛇口的龟山别墅。我和几位朋友跑去看他。那时候他的身体还不错，声音也非常爽朗。我们在一家湘菜馆兴高采烈地吃火锅，谈论文学，谈论我们新近出版的散文选《每棵树都有牵挂》，和各自近来的创作。他问我在写什么，有什么打算。我告诉他我想写一部文人史，把文人的命运史、心灵史用叙事散文的方式讲述出来。

说实话，那时候我并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力量完成这项计划，也没有想好从哪个角度去写，最后写成什么样子。从讲述文人行为入手，是后来想到的主意。在那个并不寒冷的冬天里，我开始守望这个诺言，开始阅读有关资料，一点点做着随笔札记。我想，这个世纪已经所剩无几了，下一个千年已经在候场。该讲述了，两年写不成可以三年，三年写不成还可以跨到下一个世纪去，我本来就不计较生命的成本。

我在这座城市里不停地写，不停地想，差不多用去了所有的业余时间。5年匆匆过去了，忽然已经身在另一个世纪。转眼间世界发生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变化，都有些认不出来了。高晓声早已经离开了深圳，后来又悄然离开了人世。我兑现了那个冬天的诺言，终于写完了这部讲述文人的书。

写完之后我才意识到，写作拯救了我。写什么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不在写。这种典型的文人行为，不知不觉中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建立优越感的努力，甚至是维护自尊的借口。我承认我感到害怕。我不想浪费十几年的文化积累，饱暖之余无所事事，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存在符号。我需要有一点优越感，需要下了班就回家的借口，需要在别人炫耀成功的时候，有一个可以让我不动声色的理由。写作可以证明我至少能够做好一件事情，从而让我感到自尊。这不是矫情的套话，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在这座没有冬天的城市里，到处充满了神话，到处都是令人羡慕的成功人士。没有自尊，根本就别想活下去。我读了20年书，曾经在几位国学大师的门下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先后当过教师、学者、电视策划人。我的价值在哪里？我的成功又在何处？我担心如果不写点东西的话，我就完全不存在了。我会成为一个充满自卑情结的小公务员，一个徒有虚名的太平文化人，在这座莺歌燕舞的城市里一点点挥发掉，最后完全走失。

这是一种古老的不安。怀着这种不安来讲述文人命运，探索文人的内心世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我甚至觉得，与其说它令我获得了讲述文人的冲动，毋宁说它让我获得了讲述文人的权力。我就是个文人，就是这个古老族群中的一分子。也许，只有以这样的文化身份，抱着这样的不安心态，才能够被允许来阅读文人灵魂的各种细节。

也许天意就是如此。我坐在灯下不停地写着，想着，思索着各种文人行为的意义；不停地与文友们谈论着圣西门、普鲁斯特、卡夫卡，把自己想象为他们的同道者。我在一篇讲述“苦吟”的散文里这样写道：“我看见了圣西门，表面上扮演着国王宫廷中乏味的朝臣，暗地里

却是一个时代的描述者和审判者；我看见了普鲁斯特，白天是贵族沙龙中一掷千金的浪荡公子，晚上却变成一个倒在病榻上疯狂写作的圣洁天使；我看见了卡夫卡，一个恪尽职守的保险公司小职员，每天下班回家，立即就转换为那个变态社会的恶毒的诅咒者。一个又一个苦役犯、苦行僧、苦吟文人，接连不断向我走来。”就这样，我不断地讲述，不断地沉吟、思索，使自己总是活在写作状态中，从而感觉到了自己的真实存在。

最早对文人命运感兴趣，是在我研究古典文学、清理文人迫害史的时候。我一直想弄清楚，文人的不幸命运，与我们这个民族的不幸命运，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我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两千三百年前，屈原留下的一个细节。我把它视为巫祝时代的某种预言。屈原在《离骚》中描写自己受到奸佞群小的围攻，最后不得已含泪出走，驾着白龙和鸾凤独自前往天庭。悲痛的诗人乘着埃风，朝发苍梧，夕至悬圃，饮马咸池，总警扶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天庭门外。这时候，意外出现了。他请求守卫天门的司閤之神为他开门，让他去面见天帝。想不到，司閤之神竟然冷冷地看着他，根本不予理睬。屈原在门外等候了很久很久，直到天黑也没有进得去。最后只得绝望而返。这个细节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它隐喻的是文人进不了天堂，文人永远得不到真正的信任和接纳。不管这个天庭象征什么，象征主流社会，还是象征封建社会的体制核心，文人始终站在门外。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也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土地测量员K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城堡外面，要求在附近的村子落户。他在破旧不堪的客栈里给城堡打电话，却听到了无数奇怪的声音。城堡就在眼前，可是他历尽艰辛，始终不能进入城堡。惟一允许他进去的地方是村长的家。村长坚持认为K的到来是场误会，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将错就错，给K安排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学校看门人。卡夫卡把城堡描写成了整个官僚机器的缩影，彻底拒绝外人的进

入。那个固执的村长，是另一个守卫天门的司閤之神。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我们民族终于从噩梦中醒来。国家开始为知识分子平反昭雪，开始大规模抢救知识分子，开始重视知识分子的价值和作用。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欢呼科学的春天，重奖一流的科学家，制订各种政策为发展科学技术保驾护航。差不多可以说，天堂为科技知识分子敞开了大门。但是，人文知识分子并没有获得同样的入场券。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学、哲学这些领域的知识分子们，文科教师、思想学者、作家诗人、翻译家、编辑记者等等，也就是过去被称为文人的那一群，仍然在远处的雪地里徘徊。

我注意到，与此同时，他们中间的先锋思想家们却在一边争论着要不要忏悔、该不该缺席，检讨着在那场民族浩劫中，他们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他们在痛哭，在不停地反省自己。我非常尊敬这些声音。不为自我的眼前处境计较，只在乎自己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的责任。然而，同时我也发现，这些痛哭和反省的声音里面有一些另外的东西。它们在弥漫，在变得越来越极端，以至于从自我角色的检讨，走向了对文人的彻底否定，变成了诅咒文人的声音。

1998 年秋天，就在我开始动笔的时候，余杰的《铁屋中的呐喊》出版。有关方面在国林风图书中心组织了该书的首发式座谈会。一大群作家、学者、编辑们坐在一起，沉痛地思考着知识分子的灵魂现状，对余杰的新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座谈中，一位据称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我不想在这里提及他的名字，头发灰白，戴着小帽，在慷慨激昂的发言中，说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中国的文人是最卑鄙下流的。”据参加会议的人后来告诉我，他的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这种情景使我深受刺激。我想问一声：这还是理智的忏悔和反思吗？我认为不是，根本不是。在我看来，这已经变成了诅咒，与封建时代的古老诅咒遥相呼应。它所煽动的轻蔑和仇恨，我们都不陌生。在清理文人迫害史的过程中，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喜欢

欢文人，有一种厌恶儒生文人的古老传统。刘邦把儒生的帽子拿来撒尿，一边泡脚一边接待文人。这种轻蔑态度教坏了天下人，教坏了一个民族。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几千年来，我们都喜欢相信文人无聊、文人无行、文人无耻、文人无用、文人相轻、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等等，几乎把这些看法变成千古定论。我不知道，今天的文人学者也这样狂热地诅咒自己，究竟是想竭力表现出批判忏悔的勇气呢，还是想尽量划清自己与文人的界线？我更不知道，这个“最卑鄙下流”的“最”，是与谁比较出来的。是与外国的同类文人呢，还是与中国的政府官员、工人农民、市井商人？

我反对做这样的比较。每一个阶级，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它的精英人物，它引以为骄傲的英雄，同时也有自己的败类和渣滓。有它那个阶层的群体优势，也有它那个阶层的群体弱点。这是常识。为什么我们提起文人，总是锁定那些反面的形象，总是让迂腐的私塾先生、狡猾的绍兴师爷、疯癫的科举秀才、阿谀的无耻诗人，作为他们的代表呢？为什么总是津津乐道于他们的风流、轻浮、偏执、呆气、怯懦这些毛病，而吝啬于提及文人的美好人格，像智慧、清高、坦荡、专注，像刚正不阿、坚韧不拔、九死不悔、富贵不淫这些特征呢？我们这个民族怎么了？为什么总是对这个有文化的人群抱持如此敌意？伟大的诗人雪莱曾经说过，“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费希特把文人称为先知，称为我们这个世界的教士，是神圣的世界之光。卡莱尔也说，“文人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真正英雄，是一切的灵魂”。罗曼·罗兰把文人称为人类中最优秀的精英，劝我们去汲取他们的勇气作为自己的精神养料。这些西方的声音为什么总是不被人们听到，总是转瞬之间便不知所踪呢？

谁也没有权利作这样的诅咒。正像我们没有权利去诅咒所有的政府官员、工人农民、市井商人一样。读者想想，古今中外的政府官员中出现过多少阴谋家，多少奸佞小人、贪官污吏、腐败分子。大面积的丑恶几乎是一种官场的常态。国民党的政治家甚至说：政治就像女

人的阴户，越脏就越想搞一搞。可是这并不能导致我们对这个群体的彻底否定，我们谁也没有权利下判断说：中国的官员是最卑鄙下流的。看待市井商人也是如此。商人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道德危机要比其他的社会群体远为严重，其基本行为方式也与其他人有所区别。尽管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下一个判断说：中国的商人是最卑鄙下流的。这种阶级、阶层、职业之间的优劣比较，会造成大规模的阶级歧视和阶级迫害。它的恶果，上一个世纪我们已经尝够了。

1999年，中国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英国人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这是一本反知识分子的书。我把它看作是一本反动的书，丑恶的书。即便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考，也不应该赶在这个时候翻译出版。西方概念的所谓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人文知识分子。这部书所叙述的对象，都是作家、思想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人。约翰逊认为，这些知识分子通常宣称他们热爱人类，但是他们爱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他们可以为人类设想出种种美妙的图景，但在实际生活中，在同家人或朋友相处时，他们大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自我中心主义者。他们忘恩负义、脾气暴躁、歇斯底里、褊狭卑劣。他们自私、猜疑、怨恨、报复、狡诈、背叛。他们在两性关系上大多谈不上任何道德。他们爱慕虚荣，对金钱特别贪婪。他们言行不一，嘴上说得很好，却不肯去实行。他们特别善于说谎、伪装和欺骗。约翰逊努力想要证明，文人无行。

按照这种举证个别的方式，我们还可以写出许多类似的书来，比如《领袖》、《将军》、《巨商》、《影星》等等，从而把那些群体丑化成最腐朽、最下流的阶层。我意识到，《知识分子》这部书在20世纪末的中国出版，实际上是当代知识分子在自我忏悔时寻求外援的一种表现，它明显构成了诅咒文人的合唱声部。这种里应外合的声音使我不得不这样认为：屈原以来中国文人的社会处境，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太多的改变。仇视文人、蔑视文人、歧视文人，进而把文人假想为社会的潜在威胁，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先天恶习。我的研究结论是：

无论哪个时代，这个民族始终抱有一种轻佻的态度，始终在纵容社会大众对文人的不恭。没有一个社会不把长治久安与文人政策放在一起考虑。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文人的不幸命运总是与我们民族的不幸命运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我渴望写一部歌颂文人的书，原因就在这里。这个社会到处都在讲述神话，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讲述一点文人的神话？至少，我们可以向它描述真实的文人，解释些许文人情怀吧。

我常常想，这种轻佻之所以能够形成气候，进而凝结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人自己是不是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人司掌文化的承传，一个民族的文化最终被叙述成什么样，文人起着决定性作用。是不是我们过多地剖析自己、批判自己，而总是忘记了歌颂自己的英雄？是不是我们只顾着为统治者和劳苦大众服务，而忽视了自己？是不是我们作为社会的良心，对自己队伍中的丑恶和污点过分敏感和挑剔，无意中起到了夸大和自污的作用？是不是我们写出来的吴敬梓《儒林外史》、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这样的书太多，日积月累误导了社会大众？难道，我们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忏悔，非得彻底丑化自己才显得有诚意？

我搜集到了太多的这类文字。仅举几个典型的例子。60多年前，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这样写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文人是中國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就没有这种知识分子了。”20多年前，台湾文人李敖在他的《独白下的传统》自序中也说：“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它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千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它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他恶心想中国的文人历来“很混，很笨，很糊涂”。可是他那本书中谈论的“直笔”、“谏诤”等等话题，

却都是文人士大夫最优秀的品质。还有一个几年前的例子，民间思想者摩罗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写道：“长期以来，我对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文化人怀着莫名的恐惧。虽然文字的事我也乐意做一些，但总想弄个文字之外的职业，以便逃避这种恐惧。这种恐惧的主要根源就是我对中国文人的极度憎恶。在我和朋友们的交谈中，用来指代最丑恶、最下流的物事的概念便常常是‘中国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最丑恶的东西总是在文人身上得到集中表现。”

你看，自我批判和忏悔就这样一次次滑向诅咒，不知不觉变成另一种声音，变成了泼脏水和妖魔化。我想起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的那个乱臣贼子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两种诅咒的声音，我听不出有什么不同。

我的看法相反。人文知识分子需要忏悔，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但是不能把忏悔和批判变成诅咒。我们更需要向社会讲述文人，不断解释文人的终极情怀。谁都在喊理解万岁，为什么不能让社会来理解理解文人呢？布罗茨基说社会大众在模仿文学说话，王尔德说生活在模仿艺术。创造文学和艺术的那些人，难道一点也不值得我们去理解和倾听？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个社会已经彻底厌倦了文人，不相信这个社会真的不需要文人在场。假如没有文人，社会将会失去思索的大脑，历史只能是一部没有声音的默片。假如没有文人，我想问，谁来给我们编织童话，谁来教我们记住祖先，谁来向我们描述理想，谁来替我们奔走呼号，谁来告诉我们忠孝廉耻，谁来鼓励我们活得要有尊严，谁来破我们的人生寂寞，谁来写我们的墓志和乡思，谁来做叛逆的囚徒，谁来做清贫的傻瓜，谁来教我们唱“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谁来教我们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中国是一个崇拜骏马的民族，有许多关于汗血马、纤离马、渥洼马等各种极品骏马的传说。诗人见到千里马，情不自禁走上前抚摸拍

打，“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骨头竟然能敲出铜的声音来，可见绝非凡马。文人呢？文人究竟是凡马还是骏马？是驽马还是真正的千里马？

我想做的也就是这样一件事情：走上前去，叩击文人。

2002年1月24日于深圳

目 录

自序 1

【登高】 给我一个高点..... 1

【祖饯】 远别离..... 17

【卧游】 从想象中获得自由..... 33

【神思】 书淫..... 49

【苦吟】 残酷的灵感术..... 75

【焚稿】 拜火教..... 97

【行吟】 走神的状态..... 111

【佯狂】 狂性大发..... 127

【绝交】 致朋友的最后一封信..... 145

【吊古】 寻找哭墙..... 173

【校讎】 人间的错简..... 195

【杀青】 天癸..... 205

【雄辩】 说服天下..... 225

【钩沉】 一个名称的灭绝..... 239

【纵诞】 名士风流..... 251

【隐居】 为什么放逐自己..... 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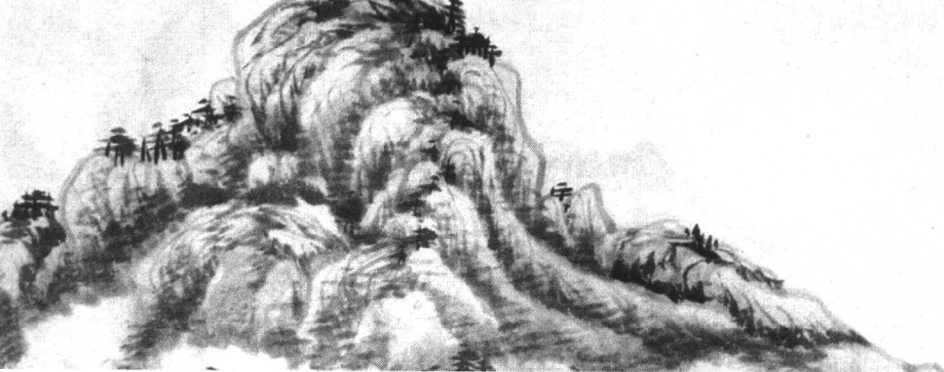
【济世】	谁配称为英雄·····	295
【游幕】	帝王谋与稻粱谋·····	311
【备课】	拒绝精确完美·····	333
【注释】	厌恶攀缘植物的理由·····	349
【称病】	示弱于天下·····	361
【自况】	文人你属什么·····	381
【修志】	献媚大众·····	395
【谏墓】	另一种可耻的厚殓·····	413
附录	常见文人行为简目·····	427
后记	·····	440



【主题词】 登高 dēng gāo

【关联词】 吊古 雄辩 自况

给我一个高点



一 猎豹冻死在山坡上

一头猎豹冻死在终年积雪的高海拔山坡上。那里没有树，没有草，也没有可以捕食的小动物，除了白皑皑的积雪之外，什么都没有。那么，它跑到那么高的地方干什么呢？作家海明威问道。

这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人们猜测动物也会有登高放眼的冲动，但找不到根据。有人好奇地去问登山家：“那么危险，又那么艰难，你们为什么偏要去爬？”登山家想了一下，回答说，“因为它在那里啊。”

这种宗教信徒式的回答让人感到意外。不能细想，细想的话会觉得被人拨动了什么，突然心弦有声。其中更多的恐怕还不是惊讶，而是内心的感动。至少我听到后是如此。好像高山静卧在那里，就构成了一种对人的挑衅，就该有征服它的冲动。或者，只是因为它高，所以值得爬上去看看。没有什么逻辑关系，人类的天性却在这样的答非所问中显露出来。

在观察传统文人的生活习性的时候，我注意到，文人比任何人都渴望高处。大多数文人都嗜好登高，而且登高必赋，或多或少都留有吟咏登高的诗篇。寻找高点，仿佛是这个族群普遍存在的一份心理偏执。我把这种习性称为猎豹冲动。他们寻找的高点，当然不限于山峰，可以是山巅，也可以是城楼、古塔、高阁、祭坛、石矾等任何地方，甚至舍弃楼台凭栏而望，也构成一种登高。只要能够取一个俯瞰的视